2015年3月30日

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冰清玉洁话苏星

□张 斌

廉洁，已经成了年年月月盘点的热词。廉洁，已经成了弥足珍贵的作风建设。

因此，人们常用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成语来形容比喻那些具有廉洁风范的人。

我原来不相信尘世间还有人廉洁到如此程度，尤其对于那些地位显赫的高官来说更是难以想象。

然而，自从结识了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苏星以后，我是完全地信了，彻底地服了，在他身上发生的廉洁故事确实是一尘不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冰清玉洁的高尚人物。

今年四月十二日，苏星逝世七周年，我仅以此文纪念。

一

就从那年的国庆电话说起吧。

2000年10月1日午后两点，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显示号：0106821……，是北京打来的。

“喂，哪位?”

“张斌吧，我是苏星。”

……

苏老来电的大意：8月17日，我们俩在奈曼家乡会面，当地政府为了欢迎他，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因忙赶路回京，他拒绝了用餐，临走时竟然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现在想起来还心存内疚。“张斌你务必替我表示歉意，并代为交付那顿饭费，一定啊!”苏星最后还特别强调：“上层不应给基层添乱，更不该留下欠佳的不良影响。”

接到苏星的电话，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像苏星这样著名的理论大家，怎么还在意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不是心细得有点儿过？为什么来电还恰巧赶在国庆节这天?

事后得知，我俩那次会面后，苏星因匆忙拒餐就离开的事，一直感到不妥，曾几次想通过电话嘱我替他交付那顿饭钱。直到国庆节那天，自家的一顿午宴，才更唤起他那次的内疚感。考虑是新世纪第一个国庆日——共和国51华诞，他约好在京的子女回家团聚，共祝国庆。可到午饭时，子女们又全都因故不来了，老俩口白白准备了满满一桌席。苏星对此不悦：这一桌美味佳肴，还有什么“剩余价值”!由此他联想到我俩那次会面后的拒餐离去，于是就立刻给我打来电话。

我再仔细一想，也就不见怪了，因为这就是廉洁自律的苏星，这就是苏星可贵的道德操守——检点自己、反省自己，无论大事小事，一言一行都用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衡量对照，防微杜渐。

想想看，像苏星这样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此的约束自己，实属罕见。一个部级干部，因拒餐负疚而检点自己的心灵，有吗？凤毛麟角。因此，中央才一再提出，作风建设和反贪反腐要永远在路上。

二

我和苏星是同乡，但我们半个世纪素昧平生。他20岁赴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就读时，我才4岁。直到199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重点记述内蒙古奈曼旗周荣九的抗日斗争故事），我才和他有了联系。

因工作关系，我较多地掌握了这方面的资料，正准备出版一本纪实性专著《抗日侠魂》。苏星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我萌生了用此文作为专著序言的念头。但是，又顾虑重重，人家是著名学者，又是部级领导干部，大家之作，岂能为无名小辈所用？但我还是抱着试探的心理，给苏星发函请求。

冒昧地试探，根本没抱任何希望，请求函发出后，我也就不当回事地忘却了。

万万没想到，十天后，我就意外地收到苏星的回复，结果大出所料，老人家慷慨应允：“只要以史实为本，用我那篇短文代序自无不可。”

然而，我粗心又无礼，接到苏星的华翰后，非但没有回信，而且《抗日侠魂》出版半年之久，也没有及时敬寄。现在想来，真有点不地道!

2000年8月17日，苏星应邀出席内蒙古开鲁县的一个重要活动，提出要到奈曼（和开鲁相邻），“看看张斌，问问他的书出版没有。”

闻此消息，我愧疚的同时，又感到无限荣幸。但在见面时送不送礼品的问题上，却着实令我左右为难。不送吧，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你用人家的文章作序，理该表示，再说，人家那么大名气，还主动来看你这个小人物，你就好意思空手相见？太不尽人情了吧！送吧，又担心老人家拒收，苏星可是会做得出来的，因为他是个从不收礼的领导干部，是一个被喻为一尘不染的学者，廉洁似乎已成了他的形象气韵和生命精髓。至今家乡人作为佳话还在传颂这样一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苏星的乡友老同学由俊清去北京求他办事，只给他带去两瓶家乡酒，却遭到他好一顿责怪：“你把我苏星当成什么人了？为老同学办点儿事不是我应该的吗？我明确告诉你，收礼办事不是我苏星干的!”结果，事办了，可由俊清还没回到家，两瓶酒钱就寄了过来，而且高出两倍的价格。

所以，这次与苏星见面，是空手还是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

带点礼品，我可是好个思量。最后，还是决定不能空手，多少也得带点见面礼，而且我还预先准备了自以为能令苏老无法谢绝的说辞：“这是一套家乡特产——中华麦饭石茶具。这可不是专为您买的，是朋友送我的多余的一套，我转赠给您，目的是求您老也为家乡的特产，在京城和全国作作广告，多给宣传宣传。这是我真实的用意，请您老一定收下，千万不要多想。”

听了我这番特意准备的说辞，苏星会意地笑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可见你是写小说的，有构思，不会是现编的吧?”然后转过脸，又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瞅了瞅一旁的秘书。

秘书也诙谐地一笑，婉转地回话：“那我就收下？权作您的广告代言费?”

机敏的秘书又朝我诡秘地眨眨眼：“您是求苏老作广告代言吧?”

还没等我开口，苏星就微微笑着频频点头。他的笑有点神秘，不知是笑我那破绽百出的说辞，还是笑他秘书兼顾彼此的圆滑。不管怎的，老人终于说出：“好吧，那我就作一回中华麦饭石的广告代言人。”紧接着，他又郑重地补充一句“仅此而已啊!”

谢天谢地，苏老总算收下了我的这点心意。

三

世人皆知，权力对人的诱惑巨大。然而，理论家苏星却从没有争权夺位的丝毫意念，有了权位非但不贪不恋，而且因为情在著述，所以还毅然决然地辞让。他最大的追求就是殚精竭虑地作好学问，作深学问，以精深的学问服务社会，奉献人民。

胡锦涛总书记曾这样高度评价他：“政治坚定，作风正派，为人宽厚，治学严谨。”这16字的鉴定再准确不过了。

1989年，苏星主动辞去兼任的《求是》杂志总编辑职务。1995年，年近古稀的苏星又几次给胡锦涛写信，希望辞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目的是让位给年轻一些的同志，从而集中时间搞研究，赶写《新中国经济史》。当得知胡锦涛答应他的请求时，他乐得像个孩子，简直要跳起来，从不喝酒的他，竟然连喝了两盅。

总算能专心致志地搞著述了！为此，他还特意为自己规定了十条守则，交给秘书。

“交给我?”秘书迟疑。

“对，交给你掌管。”苏星诚恳地说，“你是我身边最近的人，请随时随地监督我。”

秘书无奈，但内心佩服。

这十条守则，其中包括：不当挂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以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或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与理事；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研究会会长等。

这十条铁律守则，其目的是充分集中时间，可内涵却充溢着一尘不染的高尚廉洁，我们也从中看到他光明磊落的内心世界和令人仰视的精神高度。

15年前，还没有现在实施的“八项规定”，而苏星同志那时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心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冰清玉洁的道德操守不受任何污染和侵袭。

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像苏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能有如此的廉洁意识和行为，实属罕见。想想看，共和国有多少部长、省长、省委书记一级的高官都曾聆听过苏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讲授，他们也都曾尊敬地称他“苏校长”“苏教授”“苏导”“苏老师”，并主动征求他的意愿，尽力为他办点儿事。

“我们那里，您有什么要办的事，尽请吩咐!”这些高官是真诚的。

“没有，什么事也没有，谢谢!”苏星每次都是如此回绝。

假如苏星要有一丝一毫的贪图之意表露，想发财，想成为富翁，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苏星就是物欲不惑，从不因个人事向他们开一次口。由此可以想见，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如果都像苏星这样冰清玉洁、纯纯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事，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目前端倪渐显的情况下，定会指日可待，我们共和国繁荣昌盛、文明健康的发展，定会根基牢固。

（作者单位：内蒙古奈曼旗政协）

为“有权不可任性”点赞

□王玉堂

在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谈及简政放权时，一句“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话，引来满堂喝彩。这不仅是因为引用了当下一个网络热词“任性”，更因为说出了权力的本质、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对待权力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不是畏首畏尾，不是不思进取，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敬而生畏，是因为内心深处的真诚敬仰、真心敬佩和真情敬重而产生的一种崇敬之心、神圣之情、庄严之感。心存敬畏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超凡脱俗的处世智慧、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追求；对领导干部来讲，心存敬畏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成熟、清醒和坚定。

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力量。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权力；没有权力，领导工作就无从谈起。但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高尚，以权兴业，因权扬名；也可以使人堕落，以权谋私，因权败身。面对权力的诱惑，从公仆到贪官，从功臣到罪犯，从座上宾到阶下囚，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一念之差、一夜之间。因此，领导干部对待权力一定要有敬畏感，也就是要做到“有权不可任性”!

有权不可任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树牢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谁授权，就要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既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要始终把职位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权力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更好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党分忧、为国尽职、为民谋利。领导干部的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要始终以党和人民的需要来决定自己对权力的取舍，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

有权不可任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用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让权力不再任性。领导干部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必须带头守法用法，带头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领导干部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不是个人的而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党纪国法约束的。权力的边界是法制。依法用权，必须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用权。一方面，要按照法律规定切实履行分内职责，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克服懒政、怠政，杜绝为官不为；另一方面，要严守权力边界，严格按照权力清单用权、按照法定界限用权，坚决防止乱作为，防止权力滥用和任性。

有权不可任性，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法则。英国近代思想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干部不受监督和约束，迟早要出问题。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既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又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积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习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守纪律、讲规矩，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坚决克服设障逃避监督的行为，坚决防止人为暗箱操作的现象，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任性”不起来。

（作者系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随 笔

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

□彭安玉

中国人向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连孔圣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吗”更是人们见面时最温暖的问候，可见中国的“吃喝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讲究点生活饮食甚至出几个“美食家”，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饥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灾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并不罕见，根本无缘享受美食。那么，又是什么人狂喝豪饮、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确，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员身体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了风靡官府的“时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对数千年中国官场吃喝掉的钱财统计一下，那肯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天文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官吏们吃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旧制度下的官场就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吃喝图”。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统治者往往励精图治，力倡俭朴，带头节衣缩食，吃喝风处于“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日积月累，出现所谓“盛世”，这时的统治者日益丧失了当初的进取精神，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可自拔，吃喝风遂如狂飙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风迅速滋长，成了谁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由此可见，王朝中期是吃喝风盛行的关键时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实在是兹事体大，最终关系到社稷安危。这一“规律”在清朝历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尚能保持戒惧之心，在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官场吃喝风不算严重。然而，到了乾隆时期，在皇帝的鼓动下，吃喝风“劲吹”，至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吃喝风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嘉庆、道光年间，黄河年修费用有五六百万金，但真正用于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们“吃”掉了。河督请客，需用一篮子猪肉，却要宰杀50头猪，只选取最好的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吃一次驼峰，竟然要杀三四头骆驼，鹅掌和猴脑也非精华者不食，甚至一盘豆腐也要花费几百金。一顿宴席，吃上三昼夜司空见惯。当时的各厅道从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听戏宴请。曾任西安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每有官员路过西安，他都要一面张灯结彩，一面准备演戏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必备鱼翅海参。演戏、宴请再加上送礼，每次花费总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于5万两黄金。为此，他十分自责，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有识者耻之”。

流行官场的吃喝风如鸦片一样摧残着清王朝健康的肌体，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其中极少数眼光敏锐者如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其时已迫在眉睫。1867年，当清王朝因洋务运动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呈现出“中兴”景象的时候，赵烈文目睹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外敌虎视眈眈的社会现实，断言大清王朝将在50年内灭亡。堪称大清朝中流砥柱、“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也深感无力回天，只能闭上眼睛对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赵烈文一语成谶，44年后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风中吃尽了自己的气数。

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耸听，扯上邦国兴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但官场的吃喝却会产生“蝴蝶效应”，不断扩展其消极影响：其一，吃吃喝喝会从星星点点的腐败现象发展成为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当一个社会的肌体健康时，即使有局部溃烂，还可以通过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将腐败现象逐渐消除，如雍正朝对康熙晚年官场腐败现象的整肃，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体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为之一新。但当一个社会陷入整体性腐败时，虽华佗在世，也是药石难治了，清朝嘉庆以后的吃喝成风，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历史反复地告诉后人：当官场出现吃吃喝喝的苗头时，就要重拳出击，将吃吃喝喝的腐败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其恶性发展后再去收拾，就为时晚矣！其二，吃吃喝喝丧失民心，动摇国本。如果吃吃喝喝仅仅是消耗了一些社会财富，那还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发展到人神共怒、丧尽民心之时，那就无可救药了。民心是社会的温度计，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尺。清朝中叶以后官场吃喝的无度挥霍，最终丧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这是历史的无情铁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貌似强大的清朝“巨舟”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间倾覆。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唯实杂志社）

文史天地

也说“圈子”

□云台人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圈子”。“圈子”的形状有大有小，其中还有隐形的，大的有方圆多少平方公里那么大，小的仅仅有笔尖那么小。请你不要小看这形形色色的“圈子”，它的“能量”着实不可小觑，有的能为你增添快乐，有的能帮你创造财富，有的还能给你带来幸福。诸如小时候推的“铁环”，各种“车轱辘”，电风扇旋转时的“浮线”，还有家中炊具“锅、碗、瓢、盆”等等，谁不经常与这些物品“打交道”；可以这么说，人的一生当中随时随地都会亲近这些形单影只的“圈子”。

不难想象，既然人们离不开这“圆乎乎”的东西，“圆圈”的作用就很容易被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延伸创新”和“潜移默化”。例如雨后春笋般的“人际圈”，就展示出人类的高超智慧。四周看去，什么经济圈、文化圈、名人圈、同行圈、老乡圈、同学圈、战友圈，朋友圈等遍地开花，都可说明这一点。从主流因素上来讲，这些圈子内同仁们，凝聚共识，相互借鉴，拾遗补阙，共谋发展，尤其是在沟通渠道、传递信息、探讨业务，加深印象、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等方面，功不可没，可圈可点，也因此逐步形成了“圈子文化”。从“圈子”中汲取营养，这无疑是件好事，值得点赞。

然而，在众多“圈子”中，也有少数一些“圈子”，在划“圈”之初，就确定了“圆心”“圆周”以及入“圈”人物的“属性”，便于今后暗箱操作，不露声色，以达到掩人耳目之目的。接着他们在阴暗角落里，勾肩搭背，拉帮结派，网络党羽，蓄聚能量；一旦形成“经典组合”的“常态”之后，犹如“大树底下好乘凉”，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利用，巧用公权，资源共享，暗渡陈仓；不需多长时间，圈内中的同僚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过后就坐拥金山，纸醉金迷，金屋藏娇，呼风唤雨，整天戴着面具过着“两面人”的腐朽生活。刚刚被查处的“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就是最典型的事例。当然了，时至今日还有那些尚未暴露、隐藏较深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人们亦相信，他们的龌龊勾当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还其本来面目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哲人言：“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搞另类“圈子”？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们受到经济大潮的影响，以至于被狭隘的名利观冲昏头脑，加上不捞白不捞的思想作祟，为此，骨子里的“别样基因”就异常蠕动。于是乎，大肆笼络“心腹”，把“圈子”打造得密不透风，为暗中巧取豪夺，投机钻营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丰硕成果。此番正印证着古训：“无德而贿丰，祸之胎也。”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事实上，生活中多一些“圈子”，并不是什么坏事，谁没有三朋四友，一个好汉还有三个帮呢。何况，多元化社会正改变着人们的交往对象、交往模式，如果一味沿袭过去那种单纯、拘谨、狭窄的交际方式，岂不是观念太陈旧！问题是搞成“圈子”之后，为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问题的关键。倘若，像前些天被查处的“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那样，划圈之初就动机不纯，进而违背原则，沆瀣一气，不择手段，把“圈子”编织成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的堡垒和工具，那恐怕就不是一般性质的了，最终是要坐大牢的，甚至是要掉脑袋的。

“争利者未尝不穷”，那些为了利益而挖空心思的人，未尝不会有穷困之时。名利虽是世间最具吸引人的东西，但，从古到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不当利益而碰得头破血流。君子爱才，取之有道。靠“圈子”发力，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纵然能够躲过一时，却躲不过一世，到头来仍将成丧家之犬，人所不齿!

奉劝那些还在“圈子”里的人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遵章守纪、多干正事。那样的话，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能吃得香甜，睡得舒坦，无忧无虑!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